

緣起於江文也・緣起於曹永坤

周婉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2007年11月在歷史系辦公室的信箱拿到《永遠的騎士——曹永坤紀念音樂會》手冊，信封寫著曹慧中，我猜是曹女士託曹永和教授放我的信箱的。隨即撞見曹教授，他問我是否拿到了，我點頭說是。回到研究室，一翻開手冊，就看到曹永坤先生的照片，笑著。那是他慣有的笑容，我彷彿可以聽到他那「沙沙」的笑聲。我匆忙把手冊閣上，好像閣上就不會難過一樣。

永坤先生友朋滿天下，有很多「小朋友」。熟識他、了解他的人很多，實在輪不到音樂圈外的我來寫紀念性文字。年前，永坤先生的家人表示希望我寫篇文章，我想主要是因為永坤先生生前支持了很多重要的音樂活動，其中一項是2003年的〈江文也紀念音樂會〉。我是該音樂會的籌辦者，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有責任紀錄下來。事實上，就是因為江文也的關係，我得以認識永坤先生，在他的晚年親承警欵，感受到一位音樂愛好者、樂評家對藝術的熱愛，以及樂於助人、沒有「分別心」的人生態度。

江文也是日治時期臺灣出身的音樂天才，在這裡，我不必多費筆墨介紹他，但對一般人而言，江文也仍是個陌生的名字，聽過他的音樂的人更是寥寥可數。2000或2001年之際吧，我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服務，當時所裡要編預算，預編兩年，主任劉翠溶教授發函詢問是否有同仁預計辦研討會，可提出申請。我到中研院服務不久曾主動

籌辦過「臺籍日本兵歷史經驗座談會」，之後參與幾次研討會的籌辦，大抵是任務分派；辦會很累，因此我沒把這件事放在心裡。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天，我走在中研院的人行道上，四周空蕩蕩的，沒有人影，不知怎麼的，想起江文也，想起他的一生，想起他那優美卻乏人聆聽的音樂作品。江文也於1983年逝世，我大略算了一下，2003年不就是江文也逝世滿二十週年嗎？1992年臺北縣政府曾舉辦〈江文也紀念研討會〉和〈江文也紀念音樂會〉，當時我還沒回國，錯過盛會，之後就沒再聽說有甚麼研討會了。熱鬧過了，江文也好像又逐漸「淡出」臺灣社會。逝世二十週年，不正是個好時機嗎？

臺灣由於歷史發展的斷層現象，加上其他種種因素，一般人並不知道我們過去有多少優美的文化遺產——文學的、藝術的、音樂的，這些可以成為我們創作泉源的東西，這些可以豐富我們生活的東西卻往往離我們很遠，甚至一點都不在大眾的意識裡。走在中研院寂寥的院區，我腦海中浮現一個意象——如果臺灣社會忘記江文也，不聆聽他的音樂，我們豈不把這位才氣縱橫的音樂家及其作品永遠放逐於亞洲的大海中？大陸似乎只有在特定的情況下才提他和他的音樂，日本不承認來自舊帝國殖民地的江文也是日本作曲家，而臺灣，難道也要忘記他？忘記這位自始至終都沒忘記臺灣的作曲家？我的腦海中浮起一個意象：我們的音樂家在環中國海域永遠載沈載浮。

於是提出申請舉辦紀念江文也的國際研討會計畫，很幸運地獲得通過。通過後，問題就來了。要辦一個純歷史的研討會，或甚至找戰爭期世代的老前輩來做個座談會，我自己就可以做到。但是，我理想中的江文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研討會，必須結合國內外歷史學界和音樂學界，而我和音樂界素無淵源，如何著手？更糟糕的是，我「突發奇想」，認為要紀念一位作曲家，光是研討會是不夠的，總得辦一場音樂

會吧。我的個性裡也許有那麼一點「執拗」的因子在吧，總之，我自己決定除了研討會之外，非得辦一場紀念音樂會不行。但是中研院的錢只能辦研討會，音樂會必須另籌經費。在這裡，我不想像流水帳一樣細說這些經過，況且很多細節也不復記憶了。讓我只簡單說明如何得到音樂界前輩和朋友的協助這一部分吧。

首先，我按圖索驥，我的「底本」是1992年臺北縣舉辦的研討會和音樂會的資料。我「毛遂自薦」，和素昧平生的東吳大學張已任教授取得聯繫，他慨然應允可以幫忙。張教授在百忙中還抽空和我見面，我向他詢問舉辦音樂會的可行性。他建議如果要辦，可以請宋如音（J.Y. Song）小姐來演奏江文也的鋼琴作品。關於張教授給予的許多具體協助，在此只能一筆帶過，但我的感激是很深的。就在這個到處打探、摸索的過程中，我得知曹永和教授有位弟弟是臺灣著名的樂評家。請音樂界的朋友恕我無知，隔行如隔山，我確實是因江文也才認識對諸位而言可能早就如雷貫耳的曹永坤先生。曹永和教授，我們一向稱為曹老師。我現在不記得是透過曹老師引介，還是「毛遂自薦」，總之，我認識了曹永坤先生，開始一段短暫卻頗為密集的「忘年交」。

從辦音樂會的構想、探聽可能的表演人選、邀請音樂家、租借場地等等，到音樂會實際舉行，是個漫長且困難重重的過程。在經費方面，我向曹永和文教基金會提出申請，很幸運地獲得通過，可以配合「江文也先生逝世二十週年國際研討會」，舉辦一場〈江文也逝世20週年紀念音樂會〉。曹永坤先生對於這對雙胞會，貢獻很多。為了不流於繁瑣，我將選擇幾個面相來敘述。不過，在此之前，我想談一下和曹先生多次見面聊天的愉快記憶。當時我的同仁鍾淑敏女士常陪我一起向曹先生請教，曹先生通常約我們在來來飯店頂樓的會員俱樂部見面（他是會員）。我們第一次見到曹先生，有點驚訝，因為曹老師很瘦小，曹先

生雖然也瘦瘦的，但身材修長，遠遠站著不講話時，給人玉樹臨風的感覺。我們都很驚訝曹家兄弟外型有這麼大的差別。不過，曹先生一開始講話，我們又覺得到底是兄弟，神似得很，都是那麼博學，而且講話和獨白差不多，往往越講越遠，聲音越來越細，讓跟不上他口中不斷冒出來的古今中外的人名和事物的我們陷入一團迷霧中。他的世界的廣闊，不是我們可以窺視的；他的經驗的豐富，不是我們可以蠡測的。但是，聽他談話，是一種享受。他總是說著說著就自己笑了起來，連笑聲都有點悄然，好像就是自己很高興而笑，不是要笑給別人聽的。

曹先生幫我們很多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贏回江文也夫人江乃ぶ女士對臺灣的信任。這話怎麼說？1992年臺北縣舉辦江文也紀念研討會和音樂會時，邀請到江文也前後兩位夫人——日本的江乃ぶ女士以及大陸的吳韻真女士來臺灣。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疏忽，並未事先告知日本夫人大陸的吳女士也會來臺。據說當天記者會召開時，江夫人突然得知吳女士也來，並且必須一起出席，深受打擊。媒體效果或許很好，第二天報上出現兩位夫人和兩位女兒江庸子和江小韻的合照和報導。我看過這張照片，吳韻真女士和女兒笑容可掬，江乃ぶ女士這邊則表情含蓄。只有當我開始進行研討會的籌畫工作時，我才聽到合照背後的「殘酷物語」，除了大為震驚之外，也深深感受到江夫人和女兒面對攝影機維持鎮定的大不容易。如果是為了製造新聞，未免太殘忍了。把一時的宣傳效果建立在個人永恆的傷痛上！之後又有電視臺到日本拍攝江文也影片，答應贈送江家母帶，結果徹底失信，江夫人和她的女兒遂對臺灣完全失去信心。去年舉辦的曹永坤紀念音樂會，手冊的標題是〈永遠的騎士〉，我想曹先生的確很有俠義精神。他知道我們要辦紀念雙胞會之後，好像就把贏回江家的信任當成自己的責任。當然，我想他除了認為1992年的事情對當事人造成莫大的傷害之外，這件事關

係到臺灣人的整體形象，因此非扳回不可吧。此外，江文也有記日記的習慣，江夫人還保存著這份資料。曹先生認為我們要研究江文也應該參考日記，他也把這件事當成自己的事。

曹先生和江夫人之間有共同的友人——臺灣戰後第一代女畫家汪壽寧女士，也就是江文也的姪子畫家江明德的夫人。江明德的父親是江文也的大哥江文鐘先生，因此，汪壽寧女士是江夫人的姪媳婦，算是相當親的親人了。1993年11月，江文鐘在世時，江夫人和女兒曾至嘉義探望江文鐘——分別60年的再見，也是最後一次的見面。可能懷著幫助我們的念頭，曹先生在2002年4月赴日，拜會江夫人，代我們轉呈信。他邀請並安排江夫人等人來臺訪問，為期五天，自5月16日至20日。訪客共有三家人：江乃ぶ女士、次女庸子小姐和外孫秋山賢史，高城淑子、春美、州子祖孫三人，以及阿部美春、惠子夫婦。曹先生是個



前總統李登輝夫婦伉儷與江文也夫人於曹府音樂會後合影（攝於2002年5月18日，前排左三曹永和，右一江庸子，後排右三曹永坤，右二周婉窈）

極端慷慨的人，八位訪客全程招待，真是大手筆。高城淑子是已故音樂評論家高城重躬的夫人；高城重躬（1912-1999）小江文也兩歲，他們因為同在橋本國彥老師那邊學音樂而認識，來往密切。江家和高城家距離不遠，走路不到十分鐘，兩家算是舊交。阿部夫婦則似乎和江、高城兩家不認識。我沾這個光，陪同他們一起出遊北海岸，可惜日語口語不好，無法和江夫人和庸子小姐深談。

曹先生請了三家的日本朋友來臺灣，只是純觀光嗎？當然不是。曹先生特地安排了一場音樂會。〈曹府音樂會〉是臺北藝文界一大盛事。認識曹先生之後，我開始了解到曹先生為臺灣音樂界做了很多事。比較專門的，我不了解，但他周圍有一群「小朋友」，隨時樂意替他辦事。曹府音樂會開放給所有「聞風而至」的人，在曹先生天母的三層樓別墅型住家，每次總是坐得滿滿的。自從認識曹先生之後，我有幸到他家訪問，看過他那滿牆的音樂CD，以及兩臺名貴的鋼琴，也成了曹府音樂會的常客。曹府音樂會對年輕的愛樂者來說，應該類似定期發生的奇蹟吧。先別說免費，那種毫無戒心地任一、二百人隨意進出，我想在臺灣應該別無分號吧？在這裡，我特別想述說的是配合江夫人一行人訪臺，曹先生安排的一場音樂會，在5月18日（星期六）舉行。

這一場音樂會邀請了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和夫人曾文惠女士，因此必須有邀請函才能入場。李前總統和江文也都是三芝人，算是未謀面的同鄉吧。可能為了歡迎江夫人，第一個節目安排蔡采秀女士根據最原始的樂譜，演奏江文也的《臺灣舞曲》；原譜影本是江夫人特地帶來的。當天江夫人穿著和服出現，讓人眼睛一亮。和服是櫻花的顏色，既柔和，又給人甜美的感覺。我想起舊照片中嬌小可人的乃ぶ小姐。那一天來了很多貴客，真可說冠蓋雲集。中場休息時，曹先生招待部分來賓到一樓用茶點，當然主要的貴賓是李前總統伉儷、江夫人和女兒，以及高城夫

人一家人。我們歷史學界頗來了一些人，也都受邀參加。我手邊有當時衆人和李前總統伉儷、江夫人、庸子小姐、曹老師、曹永坤伉儷合拍的照片。現在回想起來，這未嘗不是人生難得再逢的一場盛會，也只有曹先生才能使之成為現實吧。他彷彿手中持著一根仙女棒，往空氣中劃出魔術。

那年九月，曹先生從歐洲回來，休息一個星期就又前往東京拜會江夫人，目的在為我們探詢有無可能提供研討會資料上的協助。所謂資料上的協助，當然就是研究江文也的學者最想看到的江文也日記。我們不敢抱任何期望，但曹先生像個喜歡拔刀相助的俠客，自個兒就做了。曹先生認為：「今天關於江文也的研究，最缺乏的是原始材料。江文也13歲到日本讀書，有寫日記的習慣（起初用中文，旋即轉為日文），直到1938年赴北京任教，共寫了前後16年的日記。這是非常珍貴的材料。……日記記載許多江文也內心的思考和感覺——我們今天困惑的不少問題，



2003年10月23日攝於國家音樂廳江文也紀念音樂會（左二至五曹永坤、陳威光、宋如音、鍾曉青，中間江文也夫人，右二曹永和）

透過日記相信可以迎刃而解。」說得多好！曹先生不是歷史學者，但他實在具有歷史學者對史料的敏銳嗅覺。他徒然而返，不過，在江家他倒是約略翻了幾則日記，也看到了江文也的畫作，一直讚賞不已。他說：「江文也才華洋溢，具有繪畫天分。他的風格接近馬蒂斯、畢卡索和夏卡爾，色彩鮮豔而有童心未泯的純樸。」此外，他也看到了1965年江文也託日本友人鈴木德衛從北京偷偷帶回的兩本畫冊。這是江文也親自用美麗的布料所裝訂成的詩詞畫集，一本為妻子而作，一本為四位女兒而作。略窺日記內容的曹先生說：「這寶貴的資料一定可以找出江文也多面的個性、創作的過程，及對原鄉臺灣的憧憬。」可惜江家家族會議決定「暫不公開」日記和其他資料。我們一方面分擔曹先生的失望，一方面透過他的描述，多少能想像江文也顯現於繪畫上的才華。

我們的音樂會和研討會分別在2003年10月23日和24日舉辦，也就是曹先生到東京訪問江夫人一年又一個月之後。由於欠缺經驗，音樂會籌辦過程遭遇很多的困難。我們的節目分兩部分，上半場是聲樂演唱，由國內男中音陳威光先生演唱江文也的詩詞作品，最後以《生蕃四歌曲》為壓軸；伴奏為鍾曉青小姐；下半場是鋼琴獨奏，由宋如音小姐以《臺灣舞曲》為首，彈奏江文也1930年代的鋼琴曲。江文也以聲樂在日本樂壇出頭，本身是男中音；詩詞譜曲是他在1940年代的重要創作類別，也有很高的評價。宋如音曾錄製一張江文也1930年代鋼琴作品集，評價很高。戰前日本名鋼琴家井上園子（1914-）曾多次演奏江文也的作品，最得江夫人之心，但她也很喜歡宋如音的詮釋。江夫人和江文也近乎「青梅竹馬」，10歲出頭即認識江文也，一起追求藝術和文學，本身具有豐厚的文化素養。音樂會遭遇的困難，我不想在此敘述，想起來胸口都覺得痛（如明明訂好的場地，事到臨頭竟然被該舞臺某負責人硬給取消）。總之，一切好不容易都就緒後，最後才發現原來音樂會賣票這麼難！

快到音樂會舉辦的日期（10月23日：江文也逝世紀念日前夕），我幾乎天天打電話詢問票房情況，毫無起色，沒人問津就是沒人問津。我們當然保留一些票贈送相關人士，但是辦一個紀念音樂會總是希望「一般大眾」能來參與，否則不符合我們的初衷。眼看日期一天一天逼近，我別無他法，於是向曹先生提到賣票困難的事。我們的「騎士」馬上要我到音樂廳買下近乎所有剩下的票，到曹府音樂會來推銷。我現在不記得日期了，總之，我帶了自己用信用卡購買的一兩百張（數目忘了，依稀記得價值幾萬元）的票到曹府音樂會。中場休息時，曹先生向聽眾介紹我，請我講點話，他接著呼籲大家認購票，支持這場音樂會。曹先生一講完，大家非常踴躍認購，一下子我的票都脫手了。除了極端感動之外，我更深刻感受到大家對曹先生的敬愛和深藏的感激。大家平常享受他大方無私的付出，一定很想回報。認購票的有在社會上已經很有地位的人士，也有在公司上班的小職員。音樂會那天可以說全場坐滿，人氣很足。

舉辦江文也紀念音樂會當然很希望家屬能出席。但是我們沒有預算可以提供機票，也不知道有1992年之經驗的江家願意不願意再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江夫人知道我們的研討會和音樂會的進展情況。出於公平的考慮，我們同樣也讓大陸的吳女士知道情況，如果她願意來，我們一樣歡迎。約在音樂會舉辦前一個星期（或甚至更近些），我在研究室突然接到汪壽寧女士的電話，希望我們留給江夫人五張票，她打算來參加音樂會。我聽了即刻把手邊握有的最好位置的五張票留下來。江夫人要來參加音樂會！對我們工作團隊而言，無疑大大鼓舞了士氣。為了怕舊事重演，我們做出一個決定，也就是不讓外界得知此一消息，免得媒體又要炒「三角戀愛」的「通俗劇」話題。我們當時為了讓外界得知紀念音樂會的活動，透過中研院總辦公室提供的媒體名單，廣發新聞稿，但沒有單位要刊登。我們知道如果新聞界知道江夫人要來參加，

一定會大肆報導，但是我們不想這樣做。一方面，我們想保護作曲家家人最起碼的尊嚴，另一方面，我們不想讓紀念活動的焦點變成作曲家講不清的私人感情問題。總之，我要行政室嚴守秘密。

原先絕大多數的媒體並不注意我們發出的新聞稿，但是就在某家報紙報導之後，媒體記者蜂擁而至，電話都接不完。這是我第一次深刻了解到臺灣媒體「追新聞」的風氣——有一家開始報導，其他家跟進；是追其他家的「新聞」。很不巧的是，有位記者在行政室走動時，聽到助理講電話的內容，揣測出江夫人要來臺灣參加音樂會。他來向我探聽進一步消息，打算報導。我無法否認，但是我認為事態嚴重，如果新聞一報出來，第二天一定又很多報要挖「花邊」，這樣一來一切都要弄擰了。我別無他法，只好懇切地跟那位記者說明我們保密的原因，我懇求他——的確是懇求，只差沒叩頭——不要發布這條消息，我說：江夫人已經92歲了，這可能是她最後一次來臺灣，我們就讓她以作曲家之妻的身份安安靜靜聽完這場紀念音樂會吧。如果您想報導，會後再報導吧。如果當時我可以叩頭，我想我一定叩頭。或許我的態度讓他鬆動，或許出於他本人的善意，第二天他沒報導這條消息，讓我們大大鬆了一口氣。我記憶力不好，不記得這位記者的大名，但我由衷感謝他：他是拿另一種思考來壓抑職業上的慣性。我們的社會不是沒有這種的人，只是需要多一些吧。

現在回想起來，曹先生為我們的音樂會花的心力，實在寫都寫不完。我想提一下宋如音小姐的事。宋小姐出生於臺灣臺南，是長老會牧師宋泉盛先生和鋼琴家陳美滿女士的獨生女。宋牧師參與臺灣早期的民主運動，是1972年長老會「臺灣人民自決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宋牧師伉儷於1970年移居美國，當時如音才九個月大；其後移居瑞士。如音小姐在歐洲接受音樂教育，1987年赴美就讀史丹佛大學，雙主修音

樂和〈微生物暨免疫學〉。1998年宋如音小姐獲得茱莉亞音樂學院博士學位，畢業後從事鋼琴演奏和教學。2001年Pro Piano發行宋如音的江文也鋼琴曲碟片，彈奏江文也1935至36年的作品，深受好評。這是我們邀請她回來演出江文也鋼琴作品的主要原因。在我們的音樂會舉行之前，如音小姐曾來臺北參加〈新逸藝術季——傑出華人青年音樂家系列二〉的演出，於2002年11月2日在臺北中山堂中正廳舉行〈宋如音鋼琴演奏會〉。由於當時我們已經邀請她在我們的音樂會演出，所以我去參加她的音樂會，並和她的父母宋牧師和陳女士見了面。同月9日，我陪同曹先生到凱薩飯店和宋小姐見面。曹先生和宋小姐有很多共同認識的國際音樂界人士，談得相當愉快。曹先生當場offer宋小姐隨時到他家練琴；他總是那麼樂於提攜後進。

音樂會快舉行時，宋小姐來信說她的父母（尤其是父親）很想和江夫人見面，他們那一輩人年輕時很景仰江文也。由於江夫人於音樂會前一天抵臺，曹先生於是在音樂會當天安排了午宴，宴請江夫人、庸子小姐、宋泉盛牧師伉儷等人，我忝陪末座。如音小姐須練琴，沒參加。江夫人和宋牧師都是寡言的人，大家也許沒談太多話，但是，再次地，這種把人從不同時空拉在一起的「魔術」，好像是曹先生的專利。曹先生也邀請宋小姐到曹府利用他那名貴的鋼琴練習；如所周知，曹府有一台Steinway，和一台Fazioli。當時家妹婉君剛好暫時賦閒，由於人手短缺，我請她全程陪伴宋小姐到曹府和國家音樂廳地下室練琴。家妹對曹府的音樂環境，以及宋小姐練琴的專注，印象深刻極了。宋小姐沒能事先和江夫人見面，但音樂會那天，宋小姐演出後，江夫人從座位起身，抱著主辦單位獻給她的花束，顫巍巍地走向舞臺，將花轉獻給如音小姐，如音小姐蹲下來接受花束，兩人似乎在講悄悄話……，此景此情，給音樂會劃上一個溫馨的句點。今天想起來，這些都緣起於江文也；但

也因為曹永坤，這些緣分才成其可能！

講了這麼多，好像曹府就只有曹先生一個人。那當然不正確。所有參加過曹府音樂會的人，都知道那是「全家人」的工作。和藹可親的曹夫人，若沒別的事，一定出席，她的聲音很明亮，像小姐一樣。曹大哥一定在會場張羅這張羅那的。如果曹家小姐歸寧的話，也一定忙進忙出的，我還看過大女兒慧敏小姐盛點心給來賓。我認得慧敏小姐，因為幾次為了音樂會的事到曹府，她恰巧都在。2002年初夏曹先生招待江夫人等一行人來訪，安排住在北投春天酒店時，她也陪曹先生到旅館看他們。曹先生似乎很疼兒女。可惜我沒見過二女兒慧中小姐，但是曹先生會跟我們提她，指著大廳牆上的畫說，這是我在法國的女兒替我選的，一副很滿足的樣子。我和曹先生的家人認識不深，但是他們給我「就是曹永坤的家人」的感覺。我想到過曹府聆聽音樂的人都有同感吧。

曹永坤先生逝世的消息，我聽到很晚。主要原因是我本不屬於音樂圈，平常又不看報。曹老師把〈永遠的騎士——曹永坤紀念音樂會〉手冊放我信箱時，音樂會已經過了。盯著日期，真恨不得時光倒轉。我的父親於大前年（2005）10月離我們而去。我的公公陳慧劍居士於2001年4月13日往生，前年我的先生陳弱水寫文章紀念他，說父親「去世已將近六年了，我常常想起他」。我的先生不是誇張的人，他寫文章字字力求精準。我當時讀了感到有點驚訝：我父親逝世後，我終於了解他的心情。家父已經逝世二年多，我時常想起他，有時還會有些極其幼稚的反應，例如出門看到坐輪椅的老人，就會想要是那是自己的父親有多好。

（家父因心肌梗塞遽逝，沒坐輪椅）。我想此刻曹家子女一定無時無刻不想念著父親。我們外人的懷思無法減輕他們一絲一毫的傷痛。但是，我還是寫了這篇悼念文章，為什麼呢？為的是那段短暫的忘年交所揭示的普遍和深層的意義。我們悼念曹先生，因為他印證了我們的文化能夠企及的

廣度、高度和深度，也就是精神面的豐饒，但是更重要的，他期望我們——他的小朋友，能夠更高、更廣、更深，更豐饒。所以，Fazioli從曹府到了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最後，我想起戰爭末期的少年永坤，為防聯軍空襲，晚上規定熄燈，他躲在棉被下，趴著用削尖的竹片滑劃在轉動的唱盤，偷聽古典音樂……

我想起我們的愛樂者，他說：當音樂家太辛苦了，我把我的快樂建立在他們的痛苦上。說完兀自笑著……

我想起化私為公的現代俠士，他念念不忘江文也的日記，說：「我們希望這份寶貴的資料能夠成為公共文化財，方不負江文也一生渴望被人欣賞、被人了解的心意。」

我想起思緒像展翅翩飛的蝴蝶而不時兀自笑著的長者。我們的眼光捕捉不住蝴蝶翩飛的路線，卻喜歡那美麗的靈動，那笑裡的忘我……

2008年初春 寫於溫州街芬陀利室

曹府音樂會奇遇點滴

劉文彰（三船文彰）

牙醫、大提琴家、音樂製作人

2007年11月4日清晨6點，Ruth Slenczynska從紐約飛抵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本來這是幾年來我邀她從美赴日來演奏或錄音時的行程中的一部分——在台灣下機短期逗留，看看在台的學生與老朋友。而這次是為了我計畫錄她的第10張CD（Brahms專集）的駕臨。

在她從紐約來台灣的數天前才知道，她要下機的4日下午2點在國家音樂廳將舉辦一場紀念曹永坤先生的音樂會。

82歲的Ruth老師不辭辛勞的歷經18小時長途跋涉，下機後僅在學生家裏休息片刻就立即展開練琴，然後趕到紀念音樂會場，預想不到的在最後彈了R. Schumann的“Romance Op.28-2”以紀念曹先生。

這感動的光景連遠在日本的我都如身歷其境深深感動。同時讓我想起2003年1月第一次在曹先生家與Ruth Slenczynska碰面的情景，如果沒有那一次的相識，可能我和她兩人以後的人生就走完全不一樣的路了。

曹先生的為人及對音樂界的貢獻，大概已有很多知友都介紹過，我就談一些從2001年起，我帶了位日本的演奏家到曹府開音樂會時所發生的幾個近乎奇跡的事蹟來記念曹先生。

記得第一次認識曹永坤先生伉儷是2001年9月。而在那前兩年，台灣中部發生了921大地震，我在日本一直想著能不能對故鄉稍盡棉薄之力，就在2000年10月帶了日本有名的音樂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弘中